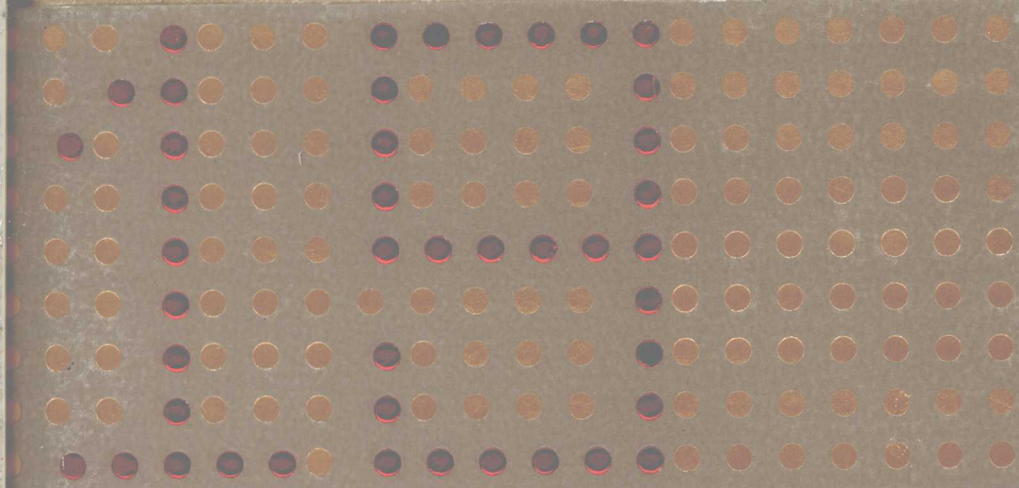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76-2000

第十九集 杂文卷

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

本卷主编 朱铁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—2000 第十九集. 杂文卷/朱铁志主编.
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9.5
ISBN 978-7-5321-3535-6
I. 中… II. 朱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②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0997 号

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, 1976—2000

In 30 Volumes

VOLUME X IX: SATIRICAL ESSAYS

Editor-In- Chief: Zhu Tiezhi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

Shanghai, China

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出品人 郑宗培

责任编辑 张安庆

封面设计 袁银昌

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—2000 第十九集

杂文卷

总主编 王 蒙 王元化

本卷主编 朱铁志

编辑: 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、发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0.5 插页 6 字数 820,000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3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535-6/I · 2693

定价: 66.00 元

序 言

朱铁志

选编 1976 至 2000 年间的杂文作品,是一项令人激动的事业。以 1976 年打倒“四人帮”为标志,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。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,杂文,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,是引领思想解放的先驱力量,是令人瞩目的电光石火。它以自己睿智的眼光、坚韧的意志、不屈的姿态,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。仿佛报晓的雄鸡,又像滚动的春雷,把冰冻的土地融化,将蛰伏的生灵唤醒。于是,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“花边文学”窥见时代风云变幻,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。由鲁迅先生开启的“社会批评”、“文明批评”的杂文传统,在这一时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,启发群伦,激励民众,推动社会变革。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,那么完全可以说,新时期文学的苏醒、奋起、繁荣,是以杂文的突破为先导的。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,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;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。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,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,以最快捷的武器对敌人做出最有效的攻击。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,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。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、历史进步的先声,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、优异的创作实绩、广泛的社会影响,彪炳文学史,笑对时代潮,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。



谈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发展,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杂文发展的历史背景。离开这个重要背景,此后的发展变化就无从谈起,就说不清楚。

新中国成立至今,杂文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,形成三次规模不等的高潮:一是1956—1957年初夏反右派运动之前,到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之后,延续不到一年时间;二是1961—1962年,为挽救“大跃进”造成的危急局面,在国民经济上采取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在文艺方面提出“文艺十条”、“文艺八条”之后一年多时间;三是打倒“四人帮”,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。“三个高潮”历经半个多世纪,然而累计起来不过三十多年而已。从总体上说,“文革”前的十七年,是杂文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时期;“文革”十年,是包括杂文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全面荒芜、彻底凋敝的时期;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三十年,是杂文最为繁荣的时期,也是建国后杂文发展最为迅速、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。然而即便是这三十年的杂文发展,也并非一马平川、毫无羁绊。杂文的兴衰,总是随着思想解放的力度和舆论空间的大小而起伏的。

以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化会议为标志,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,即文学史家所说的“当代文学”时期。建国后的两三年,国家虽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,但新的人民文艺却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局面,各种文学样式不断涌现佳作,文学新人层出不穷。然而,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杂文,却显得相对沉寂。尽管有夏衍的百余篇专栏文章、有“马铁丁”(陈笑雨、张铁夫、郭小川)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的“思想杂谈”、有1953年《人民日报》集中发表的一批杂文、有1954年上半年由于引进苏联“小品文”带来的杂文的短暂“繁荣”、有1956年《中国青年报》“辣椒”副刊的系列短文,但就总体而言,这一时期的杂

文创作是相对萧条的。直到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“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,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,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”之后,杂文才迎来建国后第一次真正的“复兴”。以《人民日报》文艺副刊为例,从1956年7月1日起,到1957年6月6日止,“花边”内外的大小杂文发表五百篇左右,作者二百余人。篇目之多,作者之众,影响之大,均属空前。从作者上看,包括了郭沫若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周建人、夏衍、艾青、臧克家、田汉、何其芳、邓拓、徐懋庸、林淡秋、袁水拍、曾彦修等一大批作家、学者和领导干部,可谓名家云集。从题材上看,举凡国际国内、天上地下、山南海北、风土人情、无所不谈。从文风上看,清新活泼、潇洒自由、百花齐放、异彩纷呈。然而随着1957年6月反右运动的扩大化,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被“错划”,杂文短暂的繁荣局面随即销声匿迹。1961至1962年间,伴随对“大跃进”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初步反省,特别是不打棍子、不抓辫子、不扣帽子的“三不主义”的提出,杂文创作再次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。但这一次的“繁荣”不像上一次作者面那样宽,其突出特点是多为高级干部写专栏,如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,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的《三家村札记》,夏衍、孟超、唐弢等人的《长短录》就是这样。1966年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全面爆发,杂文不仅和其他文学艺术样式一样被彻底消灭,而且许多杂文作家的肉体生命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,再也没有看到新时期的曙光。

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,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三十年间,杂文“繁荣”的累计时间不过两年多。这就是新时期杂文的基点和出发点。明确这一点,对理解新时期杂文的繁荣非常重要。

二

新时期是新中国杂文史上最好的时期,是杂文真正繁荣复兴的伟大时期。清除“四害”,普天同庆。色彩斑斓的杂文创作像奔涌而出的潮水,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区,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。其声势之浩大、题材之广泛、作者之众多、风格之多样、影响之深远,是以往任

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。

一是创作数量异常丰富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,杂文创作总量极其有限,报刊阵地就那么几家,出版文集就那么几种。屈指可数的杂文家并不以杂文为业,而是在从政、治学、创作之余偶或为之,数量不多,影响有限,不成阵势。新时期杂文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,数量之多,不可胜数。严秀先生主编《中国新文艺大系(1976—1982)杂文卷》时,只是新时期的头几年,搜集的杂文集已近百种。到我1992年协助牧惠先生选编《中国杂文大观》第四卷时,搜集到的杂文集已有几百种。虽然我的统计并不具有权威性,但证诸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各位杂文前辈的个人所存,可以肯定地说,新时期杂文创作数量已不是几十倍、几百倍于此前三十年了。仅从这一个侧面,也足可得出国运兴则杂文兴的结论。

二是创作质量达到很高水平。过去三十年间的杂文虽然各具特色,显示出当时的时代印记。但就总体而言,水平并不是很高。著名的《燕山夜话》、《三家村札记》、《长短录》等,或者是谈古论今的知识小品,或者是去腐生新的思想评论。其“社会批评”、“文明批评”的思想锋芒有限,往往是对个人的思想修养、工作作风、社会风习作十分善意而有节制的论说,社会价值、美学价值都不能说很高。新时期杂文无论在思想力度上,理论勇气上,还是在触及制度和体制深层次的问题上,都显示出更加成熟、更加深刻的理性精神和思辨力量。其感染力和冲击力,是前所未有的。这一点,可以从秦牧、严秀、章明、虞丹、牧惠、舒展、邵燕祥、何满子、吴有恒、周修睦、王春瑜、陈四益、鄢烈山等人的创作,以及1988年《人民日报》“风华杯”征文的众多作品中看出。

三是创作阵地空前增多。和前三十年有限的几块阵地相比,新时期杂文阵地可谓异常之多,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副刊都设有杂文专栏,广播电台经常播放杂文作品。著名的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,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副刊,《中国青年报》“求实篇”,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副刊,《解放日报》“朝花”副刊,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副刊,《今晚报》“胆剑篇”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还有一批专业的杂文报纸、刊物应运而

生。河北的《杂文报》、《杂文月刊》，吉林的《杂文选刊》，安徽淮北的《杂文》等广受关注，成为读者新宠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新时期前十年中，几乎有报纸就有杂文，有杂文就不乏精品。

四是杂文组织和作者队伍空前壮大。前三十年全国各地基本没有专业杂文组织，杂文作者大都属于散兵游勇。新时期以来，许多省市成立了杂文学会，不少党政领导和文化前辈出任学会会长，河北的高扬、北京的胡昭衡、吉林的谷长春、上海的罗竹风等就是其中的代表。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达了对杂文事业的支持。作者构成也突破前三十年格局，显示出异常的丰富性。作家、学者、编辑、记者、教师、干部、军人、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个体户、自由撰稿人，几乎社会各领域、各行当都有人写杂文。“风华杯”征文不仅有著名作家、杂文宿将参与，也有个体劳动者、自由职业者写来题材不同，风格各异的佳作。作者队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海纳百川、丰富多彩。

五是创作广受关注、评奖此起彼伏。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人心，新思想、新观念层出不穷，新思潮、新举措令人目不暇接。一时间，写杂文、看杂文、爱杂文、传杂文、议杂文，几成时尚。各种征文活动如雨后春笋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几乎没有间断过。既有地方报刊、学会的征文，也有1989年春中国作协组织的全国性的散文杂文评奖，亦即后来的鲁迅文学奖。邵燕祥、牧惠、舒展、何满子、章明等宿将成为各种奖项的常客，以鄢烈山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秀也经常榜上有名。杂文的繁荣不仅丰富了自身的创作，也间接促进了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。由乐秀良先生《日记何罪》一文引发的轰动效应，就吸引了几千封读者来信，促成一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。

六是杂文理论评论整体水平提高。过去三十年间，杂文评论主要集中在黄裳、夏衍、冯雪峰、林淡秋等少数几位名家有限的议论当中。黄裳的《杂文复兴》、夏衍的《谈小品文》、冯雪峰的《谈谈杂文》、林淡秋的《批评性小品文试谈》是其中的代表。新时期杂文评论不仅散见于各种作家、作品的评论当中，而且集中出版了一批系统论述杂文创作的理论著作，涌现出一批世所公认的杂文理论和评论大家，严秀先生就

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他在主编 1949 至 1966、1976 至 1982 两卷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杂文卷》过程中写下的两篇著名“导言”，几乎涉及建国以来所有重要的杂文问题，涵盖之系统全面，论述之权威深刻，足可成为后来者学习研究杂文的典范和必读文章。除严修先生外，邵传烈先生的《中国杂文史》，张华先生的《中国现代杂文史》，姚春树、袁勇麟先生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》等一系列著作，史论结合，新见迭出，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。牧惠、邵燕祥、蓝翎、宋志坚等在勤于创作的同时，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，写下了大量杂文理论和评论文章，牧惠先生在与刘甲、颜元叔等人的论战当中，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杂文理论，把对杂文理论的研究和评论向前推进一步。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：刘甲先生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三本“新基调杂文”小册子，虽然受到杂文界的批评和质疑，但应该说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触及到当代杂文一些不容回避的矛盾和问题，由他引发的“鲁迅风”与“新基调”的论争，对杂文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。

七是繁荣持续时间长。如前所述，过去三十年间，杂文真正的“繁荣”不过两年而已。而 1976 至 2000 年，杂文整体处于持续繁荣发展之中。其中尤以 80 年代最为令人瞩目，呈火山爆发之势，一发而不可收。如此长时间的繁荣态势，如此数量众多的佳作涌现，在新中国杂文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

三

题材是否丰富，思想含量是否充足，表现手法是否变化多样，是一个时期杂文创作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，同时也是这个时期民主政治是否清明、思想文化是否进步、人民精神状态是否欢愉的晴雨表。

新时期杂文的繁荣，首先体现在题材的无限丰富上。翻看这一时期的杂文作品不难发现，杂文的脚步是与时代前进的脚步紧密相连的。有时，步时代风云之后，杂文乘势而上，步履轻快；有时，独醒于众生迷惘之前，杂文未雨绸缪，发人所未发。这一时期，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

事件杂文都有反映。举凡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、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；呼唤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大解放，让思想冲破牢笼；彻底否定“两个凡是”、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；彻底否定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呼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、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；彻底否定“文革”，呼吁不忘历史教训，建立“文革学”和“文革博物馆”；彻底否定“三种人”，提醒善良的人们警惕“江东子弟今犹在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；坚持有左反左、有右反右，但主要是坚决反对给党和国家造成深重灾难的左的思潮；倡言民主法制、批判封建主义、官僚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，呼唤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；呼唤理解人、尊重人、敬畏人民、把人当人，声讨残酷践踏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封建法西斯独裁行径；呼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；坚决反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逆流，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；坚持杂文“社会批评”、“文明批评”的光荣传统，勇敢面对所谓“歌德”与“缺德”的争论；辩证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、力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；理解科学、尊重科学、学习科学，倡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拥护科教兴国战略；积极介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；积极介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后有关姓“社”、姓“资”问题的争论；积极应对“否定鲁迅”的歪风，旗帜鲜明地主张“鲁迅没有过时”、“鲁迅所倡导的批评的和战斗的杂文更没有过时”；积极应对“爱国”与“卖国”的争论，提出什么才是真正爱国的重要问题……在所有这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事件面前，杂文或参与其中，成为有效的助力；或打响第一枪，成为引领潮流、冲锋陷阵的坚强战士。不论以什么方式，它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

选入本卷的第一篇杂文是秦牧先生的《鬣狗的风格》。在众多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的战斗檄文中，本篇未必是第一篇，但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的一篇。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，它是新时期杂文的开先河之作。严秀先生称其为“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杰作，也可以说是一篇重振杂文旗鼓的代表作”。作者通过对鬣狗形象的生动描摹，写出了那些紧跟在狮虎之后窥测方向，一有机会便蜂拥而上、

啃噬血肉的鬣狗嘴脸,是对“四人帮”及其党羽丑恶本质的深刻揭示。一句“鬣狗式的人物依然存在”的警告,振聋发聩,令人警醒。作为散文家的秦牧先生,善于运用自己生动的文笔、丰富的学识,旁征博引,纵横捭阖,其文自有一番收放自如的从容和老到,堪称新时期杂文中的美文典范。收在本卷中的《哀“八旗子弟”》、《皇帝瘾》、《奸臣的“定场诗”》题材各异,指向不同,但都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深沉厚重、从容老辣的创作风格,使人过目不忘,回味无穷。

与之相映成趣的,是刘征先生的《“帮”式上纲法》,同样是揭露批判“四人帮”丑恶本质的檄文,但作者采用的是另一种笔法,庄谐互见,运思奇巧,把那种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的野蛮嘴脸入木三分地写出来了,让人清醒地看到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是如何颠倒黑白、罗织罪名的。刘征先生是资深语文教育专家,同时又是非常优秀的杂文家和诗人。所写杂文题材丰富,构思奇巧,风格多样,语言有味。除本篇外,本书还选了《庄周买水》和《鼠辈的变异》两篇。前者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最著名、最成功的杂文作品之一。作者以诙谐的笔调,辛辣地讽刺了市场经济大潮之下一些人买空卖空、投机倒把的荒唐行径。文章寓深沉厚重于表面调侃轻松之中,有举重若轻之风范,有一招致敌于死地之功效,其卓尔不群的鲜明特色,开一代新风,成为新时期杂文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品。

“四人帮”之所以能够横行肆虐、“文化大革命”之所以能够泛滥神州,其根源,在于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,在于民主法制的极端不健全和对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。个人意志取代党和国家的意志,独断专行代替集体决策。思想向强权献媚,人格为利益扭曲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什么样的人间丑剧不能上演,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不能施行?正如秦牧先生在《奸臣的“定场诗”》中深刻揭示的:“凡是政治上品格卑污的人,生活上也总是下流龌龊。”这些唱着“别人笑我做奸臣,我做奸臣笑别人。我须死后才挨骂,别人生前早亡身”的家伙,一靠阿谀奉承,二靠狠毒害人,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。问题在于“康生这类蛇蝎式的人物何以青云得志?这类人物是依靠什么条件

得逞的?”周修睦作于1979年3月的《从〈国际歌〉和〈东方红〉说起》，是一篇惊世骇俗的杂文力作。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、极大的政治勇气，敏锐地发现了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”和“他是人民大救星”之间的深刻矛盾，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有神论之间的自相矛盾。文章题材重大，立意高远，推理缜密，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，是一篇真正具有现代民主意识、最能体现杂文家独立人格、自由风骨的不朽篇章。收在本卷中的作者的其他几篇文章，《往事不如烟》拒绝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，拒绝廉价地“遗忘”，最早从宪法层面提出反思“文革”的问题，认为中国人既缺乏民主传统，又缺少法律意识，这是“四人帮”疯狂肆虐的社会基础。《“读圣贤书，所为何事？”》纵横古今，抨击无行文人，意在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打着“主义”旗号，行结党营私勾当的假文人、伪文人、真正的政治骗子。

章明先生的《吃运动饭》可视为揭露“三种人”嘴脸、彻底否定“文革”的又一力作。那些平日并不起眼，运动一来马上精神抖擞，“平时一条虫，运动一条龙”的机会主义者，我们一点都不陌生。多少善良正直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毁灭在他们的“运动素质”之下，多少勤劳朴实的普通劳动者淹没在他们的“运动浪潮”之中。问题在于，为什么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总是能够给这种“鬣狗式的人物”以机会？为什么在相当一段历史岁月中正义并不总是能够战胜邪恶？为什么好人总是倒霉而恶人总能得志？章明先生的文章不啻是一副清醒剂，让我们浑身发冷、头脑清醒。

与本文相映成趣的，是林放先生的《江东子弟今犹在》。本文作于1982年3月，在《吃运动饭》发表两年后。这篇表面平淡、内里张力十足的杂文，提醒人们虽然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做出彻底否定“文革”的决定，但专靠“吃运动饭”起家的“江东子弟”并未绝迹，一俟气候适合，他们还会“卷土重来”、“东山再起”，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警惕！

经过十年动乱，呼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，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“一言堂”，成为80年代初最为强劲的主旋律。1980年2月，牧惠先生发表著名杂文《华表的沧桑》，文章从征引史料开始，娓娓道来，述说

华表作为“诽谤之木”的历史变迁。指出历来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,往往要做出虚心纳谏的样子。起初或许不无真诚,但到江山坐稳、权力无虞的时候,就听不得不同意见,就要“诽谤者族”了。文章沉郁厚重,透过重重历史迷雾看到法制建设的路途艰难,看到封建主义、官僚政治的根深蒂固。作者史学修养深厚,历史眼光独到,善于从史料中挖掘杂文题材,从不经意间引出貌似“闲笔”的精到见解,使作品文质俱佳,引人入胜。这种“史鉴体”杂文深得“春秋笔法”的真髓,是新时期杂文成绩最为显著的文体样式之一。

与之具有相同特点,而史学观照更为明显的,是王春瑜先生的杂文创作。选在本卷中的《“株连九族”考》、《语录考》、《“万岁”考》几乎通篇都在“讲古”。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,文章论说的分明就是当下。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,我国明史研究专家。写杂文是作者学术研究的余绪。但正是这“撙草打兔子”的“额外功夫”,显示了长期积累之后不动声色的真本领。作者驾驭史料娴熟、运用史料老练,绝不是依靠几本类书、扯出几条掌故,故作高深者可比。杂文的“历史纵深感”是杂文家们经常议论的话题。这种感觉从何而来,牧惠先生和王春瑜先生的创作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答案。

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和“皇帝瘾”由来已久,这是长期封建社会积淀的必然结果。政治清明的社会、法制健全的社会,人们无需乞求几个清官甚至开明皇帝为民做主,人民是自己的主人。而在法制不健全、人治很猖獗的时候,呼唤清官,就成为百姓特别可以理解的“思想痼疾”和“性格弱点”。不少优秀的杂文家看到了这一点,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。其中尤以邵燕祥先生的《切不可巴望好皇帝》最为著名。文章作于1980年7月,“四害”甫除,人心思治,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无所不能的“明主”、“圣君”,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社会心态。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邵燕祥先生发出“且切不可巴望好皇帝”的呐喊,这需要怎样的胆识和勇气!本文之后,不少相似题材的文章接踵而至,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,有效地传播了民主思想,在风云际会的80年代初,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。惜乎这种不懈的努力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相比,

还是显得那么微弱,以至于至今银幕上、荧屏上皇帝戏依然盛演不衰,左一声“圣上”,右一声“皇上”,动不动“扑通”一声跪将下去,身体与人格立刻矮了半截儿。但这丝毫无损于此类杂文的社会价值,相反,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,恰恰证明了反封建任重道远。

邵燕祥先生是新时期杂文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。早在20世纪50年代,二十多岁的他就以诗歌蜚声文坛,成为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。无奈反右运动一个早上使他被迫搁笔,一放就是二十年!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,中年邵燕祥重返文坛,已不是单纯的诗人。痛苦的磨砺和深沉的思索,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杂文家。复出后短短二十年间,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冷静的思考,写出了难以数计的杂文佳作,出版了几十本杂文专集。收在本卷中的《建立“‘文革’学”刍议》、《小题大做》、《论“只剩下一个人”》、《避席畏闻篇》等较好地代表了他涉猎的题材和创作风格。

需要特别强调一句的是体现在《小题大做》一文中的文体价值。我将这种断想式的杂文称为“格言体杂文”。顾名思义,这种杂文具有尼采式的精警、帕斯卡尔式的深邃、泰戈尔式的优美。表面看好像是互不搭界的只言片语,实际上是长期思考、一朝呈现的灵感发现。写这种杂文格外需要思想、需要见识、需要才情、需要禀赋。或许是都有过写诗经历的缘故吧,刘征先生、流沙河先生、王大海先生、叶延滨先生也有这个特点。他们的杂文或者直接以“格言体”形式出现,或者行文当中自觉不自觉地夹杂诗的律动和跳跃。这使他们的杂文更加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感,读来更加琅琅上口。

在这里,我想特别提一提巴金先生。众所周知,新时期以来巴老以“把心交给读者”的精神,倡言“说真话”,倡议建立“‘文革’博物馆”。一部蕴含痛苦与血泪的《随想录》,清晰地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。这个令人尊重的老人忠实地继承了鲁迅先生的优良传统,在解剖社会的同时,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,向灵魂深处的“毒气”和“鬼气”进攻,向“瞒”和“骗”的种子开战。收在本卷中的《说真话之四》和《“文革”博物馆》集中体现了巴老的思考。他在文章中所体现的崇高的人格力

量,深深地教育了所有杂文家,感染了整整一代中国人。由他老人家所倡导的以“说真话”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精神,至今依然是我们应该时刻记取的。

或许我无法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所有入选者的杂文进行评说,但乐秀良先生的《日记何罪》不能不提。因为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具有的文体价值。在那个人妖颠倒的黑暗年代,文字狱泛滥是家常便饭。这个中国“古已有之”的破烂儿,到了“四害”横行时期,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因言获罪的传统从“胡风反革命集团案”开始,可以肆无忌惮地从私人信件、日记中寻章摘句,罗织罪名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多少人人生的悲剧就这样上演,多少人青春年少葬身在自己构筑的语言陷阱之中。人的尊严、人的价值、人作为人起码的言论自由、通信自由被无情剥夺、残暴践踏。夫妻不敢说真话,母子无法表真情,人民没有免于恐惧的基本权利。因而,当乐秀良先生于1979年在《人民日报》发出《日记何罪!》的愤怒呐喊,立即引来无数共鸣。多少人饱含血泪致函乐先生,诉说自己的不幸,感叹民族的悲哀。由此引发的讨论旷日持久,影响深远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,中国人开始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叫做“隐私权”的东西,开始懂得言论自由、通信自由、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子。

四

粗略梳理了新时期杂文创作之后,我想谈一谈这一时期杂文创作中几个带有共性的问题。

一是关于杂文的思想性。毫无疑问,思想是杂文的灵魂,批判是杂文的根本属性。再好的材料、再好的文字、再好的构思,如果不以思想为灵魂、为内核,都是枉然。有时巧妙的构思、优美的文字可以掩盖思想力度之不足,也能给人以一定的阅读美感,但稍微一深入,就容易暴露花哨外表下的空洞和虚弱。严秀先生说:加强杂文的思想深度和广度,是所有杂文家的首要任务。这是锥心之论,是至理名言。一个杂文

作者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功夫,注定是没有出息的。

二是杂文需要学养灌注。杂文的思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。它既来自实践,又来自学养根柢。鲁迅先生“孤岛”十年几乎足不出户,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杂文佳作,靠的就是学养灌注的深刻洞察力。朱光潜先生说:“不通一艺莫谈艺”。第一个“艺”字,是指具体的艺术门类,如文学、戏剧、建筑、绘画等;第二个“艺”指美学和艺术规律。就是说,如果不掌握、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形式,最好不要妄谈艺术规律。借用一下这个观点,不妨说“不通一理莫写杂文”。这里的“理”,是指某一学科,如哲学、历史、经济、法律、社会学、管理学、心理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,等等。最好受过某一方面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,具有较为完备的逻辑思维能力,然后可以尝试杂文写作。当然,我不敢夸耀说收在本卷中的所有杂文家都“通一理”,更不敢妄言“不通一理”者没有资格写杂文。但略通一门,旁及其他,总是利大于弊,这是不消说的。如今很多报刊青睐专家学者的言论,原因也在于此吧。

三是杂文的引经据典。杂文常常引经据典,这是增强文章思想性、知识性和历史纵深感需要。优秀的杂文通过现实穿透历史,同时也从时间深处洞察现实,从而引来横跨古今的深沉思考。有些杂文以史料为由头,由此说开去,犹如抽丝剥茧,层层递进,最后得出结论;有些杂文似乎通篇“讲古”,不涉及现实,却是声东击西,意在言外,最后略点一笔,全篇皆活。在这方面,王春瑜、牧惠、陈四益等都是高手。在我看来,第一,“引”和“讲”都是手段,不是目的,是“台”,不是“戏”,不能以材料淹没观点,更不能以材料代替观点。有人以为杂文的正路便是来上一段“古人云”,再发上一通议论。这是对杂文写作的误解,也是许多读者对杂文不以为然的原因之一。第二,杂文写作当然不妨从史料说起,但不能说起就是说止,必须由此及彼、生发开去,有所发挥、有所超越,成一家之言,说出属于自己的观点。正如严秀先生提醒的那样:无力“说开去”,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标题。第三,引述古籍和典故,应有自己的发现,是大量阅读基础上的信手拈来,不是东拼西凑、东挪西借的装点门面。最好是采用别人很少使用,或者即使别人使用,但没

有独特发现的材料,而不是用尽人皆知的东西作旁征博引状。一说纳谏,就扯出李世民和魏征,说得读者耳朵都起老茧了。说到底,引述只是由头,是引子,是闲笔,不是正剧。一些作者之所以引得蹩脚,还是因为功底不深、内存太小,肚里没货。

四是杂文的“杂而无文”问题。杂而无文,行之不远。所谓“杂而无文”,是说一些杂文缺乏艺术表现力,语言枯涩,结构松散,逻辑随意,缺乏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理性之美。这也是新时期杂文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。优秀的杂文家往往自觉排斥杂而无文的杂文。在他们的心目中,杂文与一般的时评是有界限的。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,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。要言之,杂文之“文”,是文明之文、文化之文、文学之文、文雅之文。所谓文明之文,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,但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。它拒绝在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,反对在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,排斥在文明假象背后的野蛮粗暴。一切陈腐的、恶浊的、反人性、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无缘。所谓文化之文,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、学理贯通、学问滋养。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,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。那家园和依托,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。所谓文学之文,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,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,讲究形象思维、框架结构、遣词造句。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,读来不仅有思辨的震撼,也有欣赏的愉悦,让人齿颊生香,回味无穷。所谓文雅之文,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,它是文明、文化、文学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,是一种下意识的自然流露、不经意的表达,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,又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。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,是长期修炼、自然积淀的结果,火候不到,是学不来的。东施效颦,徒增笑柄而已。

五是杂文的文体意识,亦即杂文的文学性问题。杂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,应该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和独特的美学表达,这是它区别于小说、戏剧、诗歌,同时也区别于时评、政论、论文的特点所在。它的文学性并不简单表现在虚构情节、塑造人物形象上,而是更加注重文章

的理趣,通过正论、反论、驳论、归谬等手法明察秋毫、见微知著,陷论敌于被动。如此说来,杂文岂不成了论文?没错,从本质上讲,它更倾向于论文,是瞿秋白所谓“议论的政论”,思想是它的灵魂。问题在于,哪种文体“思想”不是灵魂呢?没有灵魂的文章算什么文章呢?大概只能算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官样文章吧。“艺术的政论”核心词在“政论”,限制词是“艺术的”。这就决定了杂文尽管以表达思想观点为目的,但其手段必须是艺术的,是可以广泛借鉴和使用所有文学手法的。一方面要像何满子先生说的那样:注重杂文的论辩性,强调言论的正确性和逻辑的扣杀力。撇开对手的枝节问题,抓住要害,一击致其死命,绝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,作无谓消耗性的纠缠。要善于“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”,将对手自以为“精彩”的论点变成他们“窝里斗”的武器,化对手的杀伤力为其自我残杀的力量。另一方面,要综合运用归纳、演绎等多种手段,既从个别到一般,也从一般到个别,通过典型事件、典型人物的剖析,弘扬真善美,鞭挞假恶丑,揭示社会发展规律,维护人民根本利益。在注重论辩性的同时,也可以通过白描等手法塑造典型形象,使读者以小见大,窥见世相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胡适的《差不多先生传》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。收在本卷中的梅桑榆的《“弄潮儿”简历》等篇什也不妨作如是观。杂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,除了论辩文章的一般要求外,还应力求做到机智幽默而不流于油滑、善用反讽而不尖酸刻薄。适当使用方言土语也可以起到通过语言塑造地域形象的良好效果。杂文的行文要富于感染力和暗示性,隐晦曲折不仅是“安全生产”的需要,也是杂文文体美的内在要求。只有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,才能使杂文更有杂文味儿和艺术性。

六是杂文的“杂”与“精”。有人以为杂文姓“杂”,故而杂七杂八、东拉西扯,下笔千言,离题万里,这是天大的误会。收在本卷中的很多作者写作数量并不大,能够使人记住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两篇,但其作用却远远胜过一些“著作等身”的“高产作家”。比如吴有恒先生的杂文创作不能算很多,但只需《〈东方红〉这个歌》一篇,就足可奠定他在新时期杂文史上的地位。所以,正确处理“杂”与“精”、“博”与“专”的关